

意识形态的权力意蕴：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在张力与当代借鉴

杨晓彤

[摘要]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出场,既根植于意大利本土哲学传统,又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理论和列宁的领导权思想一脉相承。为了克服资本主义政治社会隐形权力的支配逻辑,葛兰西将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与“阵地战”视为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要素。这一既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相对于经济基础的“观念能动性”,又不脱离具体社会关系与阶级力量对比的“物质制约性”的辩证思考,正是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要义所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不仅为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的文化转向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更为全球南方国家探索一条既积极构建自身文化政治认同,又深度契合本土社会历史文化条件的自主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借鉴。

[关键词]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意识形态;权力;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26]02-0101-11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问世以来引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持续研究。威廉斯曾说:“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里,尤其是在葛兰西的作品里,这个词(文化领导权——引者注)变得非常重要。”^①在葛兰西的总体性革命战略中,资产阶级对民众的统治并不仅限于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等强制性手段,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更是依赖一种基于民众自愿认同的“智识和道德”^②领导权。因此,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便是依靠有机知识分子在市民社会的广阔阵地上进行一场持久的“阵地战”,最终形成夺取文化领导权的集体意志。在这一过程中,葛兰西既将意识形态作为一个需要被夺取和运用的权力场域,强调其具有塑造共识和合法性的积极构建功能,同时又将其视作一个必须被揭露和瓦解的统治工具,批判其遮蔽真实社会关系的虚假本质。这种对意识形态权力属性的“解构性”与“建构性”的双重解蔽,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理论活力的重要来源。正是基于这种复杂权力的视角,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不仅为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话语转型与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时代批判奠定了经典范式,也对当今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现代化治理具有重要启示,更为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话语场域中谋求主体性,并进一步探索符合自身发展道路要求的意识形态建设策略,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借鉴。

一、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谱系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作为具有创新意义的革命理论与话语体系,根植于对多元思想传统的批判性继承与创新。在这一理论谱系中,意大利的本土政治哲学与历史思想、列宁的革命领导权学说,以及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共同构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思想基因库”。

作者简介:杨晓彤,女,法学博士,浙江大学哲学学院助理研究员,浙江大学未来哲学研究院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重要论述引领浙江实践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5CCG05)的阶段性成果。

①[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145页。

②[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第一,对意大利本土思想传统的扬弃与转化。就文化领导权的主体语境而言,马基雅维利的君主思想对葛兰西塑造“追求一定政治目的”的“集体意志”^①具有深远影响力。马基雅维利极为重视人民对国家统治所发挥的“堡垒”作用,“当大众一旦不再相信君主的时候,他就同他的新制度一起被毁灭了”^②。但人民对统治权力的支持不能仅基于君主强有力的组织,还必须依赖文化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以此助力集体意志与其“拟人化”象征的融合。葛兰西将马基雅维利的“君主”隐喻,创造性地转换为“成分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它就是政党”^③,这就意味着对“民族-大众”进行“精神和道德改革”的组织者不再是英雄式的个人,而是具象化为代表工人阶级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无产阶级政党。

就哲学立场而言,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则的基本认知,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奠定了唯物史观基石与哲学底色。拉布里奥拉批判了将历史发展归因于精神运动的唯心史观,认为这种“科学的乌托邦”^④是从人的头脑中生发的观念,因而并不具备客观实在性。相反,唯有“以存在形式解释思想形式的历史唯物主义”^⑤,才能揭示物质生产与思想意识的内在关系。作为对“拉布里奥拉所研究的整个问题的发展和深化”^⑥,葛兰西一方面继承了拉布里奥拉对庸俗唯物论的批判,摒弃了庸俗唯物主义“把整个历史降低为算术”^⑦的机械论,转而强调真实的历史应是由“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与“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⑧相融合的“有机体”。另一方面,葛兰西沿袭了拉布里奥拉关于“自然和精神之间统一关系”^⑨的辩证立场,并以“历史集团”概念透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在“基础与上层建筑形成‘历史的联合’”^⑩的思想构境下,意识形态范畴从作为经济基础的“辐射和反映”,提升为反作用于社会生产关系的能动性因素,使得文化领导权的运作场域建立在“结构和上层建筑之间交互作用的真实的辩证过程”^⑪之上。

克罗齐的实践哲学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提供了关注现实生活的方法论参照。克罗齐打破了仅仅将哲学“限定为‘一般的’或‘形而上学的’”^⑫教条化偏见,阐释了历史“作为现在的力量而融化和转化于现在中”^⑬的“当代性”,提倡一种聚焦人的现实生活的批判哲学。然而,与克罗齐将实践视为精神自我运动的附属品的观点不同,葛兰西将实践视为现实的人在特定时空环境和社会条件下,以客观物质世界为对象而展开的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活动,从而实现了从“以头立地”到“以脚立地”的方法论翻转。除此之外,在国家治理层面,尽管葛兰西阐发了克罗齐“伦理政治”概念的实践价值,认为其揭示了“文化霸权以及文化因素和文化行为对于国家的必要性”^⑭,但葛兰西坚决反对克罗齐精英主义的渐进式改良观念与“消极革命”的主张,转而将文化领导权重塑为依托教育启发并凝聚大众自愿认同的革命实践行动。

第二,对列宁领导权学说的深化与拓展。结合西欧的革命实际,葛兰西将列宁的政治领导权提升

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9、40页。

②[意]尼科洛·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51页。

③[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④[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页。

⑤Antonio Labriola, *Socialism and Philosophy*, New York: Telos Press Ltd, 1980, p. 62.

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8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45页。

⑦[意]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潏、孙魁、朱中龙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1页。

⑧[意]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杨启潏、孙魁、朱中龙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3页。

⑨[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4页。

⑩[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8页。

⑪[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页。

⑫[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20页。

⑬[意]贝奈戴托·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8页。

⑭Antonio Gramsci, *Further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95, p. 345.

为文化领导权。葛兰西指出：“伊里奇所完成的领导权的理论化和实现是伟大的‘形而上学’的事件。”^①具体来说，列宁提出“领导权”概念旨在反对“经济主义”的错误倾向，其内核是通过形塑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确立其在阶级联盟中的领导地位，并使其“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②。也就是说，列宁的“领导权”概念既指涉无产阶级必须掌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领导权，也隐含着对“政治自觉性”与革命意识等文化因素的重视。因为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对革命同盟的领导权依赖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等先进理论的“外部灌输”，这已经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文化领导权的意味。受此启发，葛兰西在1926年论及都灵共产党人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工人国家的社会基础问题”^③时，提出了“领导权”必须具有“联盟”“赞同”等必要“部件”，“在无产阶级能够成功地创造一个阶级联盟体系——这一联盟允许无产阶级动员劳工人口中的大多数反对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国家——的范围内，它能够成为领导的和统治的阶级。在意大利，在这种现实存在的真正阶级关系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它成功地赢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赞同”^④。但关于具体以何种方式赢得其他阶级的认同与支持，葛兰西并未明确提及，因而本质上仍是一个尚未“发育”完全的、不成熟的理论雏形。随着对“在同一时期，整个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却没有成功再现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取得的胜利”^⑤的深刻反思，“葛兰西指出，正是列宁本人提出了领导权（统治加思想和道德的领导）的理论作为对国家-武力（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补充，作为马克思理论的当代形式。这一切，意义是明确的：统治（强制）是一种行使政权的方法，是一定历史时期所必要的，而领导则是保障以广泛赞同为基础的政权的稳定性的方法”^⑥。也就是说，葛兰西认同政治统治在特定时期对于确立并维持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性，但在市民社会发达的西方，权力稳定的关键更在于民众的自觉服从与自愿认同。“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主流意识形态（如新自由主义、消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现有的经济秩序和阶级结构。”^⑦因此，革命的关键前提在于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即首先破解统治阶级的文化“密码”，这便将领导权的重心从列宁的政治战略联盟转向隐蔽的文化与道德领域。

第三，对马克思阶级意识观的综合与创新。在关于无产阶级如何形成革命意识的问题上，葛兰西辩证地综合了马克思与列宁的观点。马克思认为，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迫使工人阶级不得不通过结社的形式结成革命的联合，从而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实践中自发地形成自我解放的政治觉悟，“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绝对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的逼迫，所以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⑧。但在列宁看来，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不能单纯地从阶级斗争的历史情境中自发“成形”，而是“要把社会主义意识从经济斗争的外面灌输给工人”^⑨。葛兰西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上述观点并未简单地采取折中的态度，而是以“常识”这一概念为中介进行批判性整合。葛兰西指出：“所谓‘自发’，指这种感情并不是通过一个已经自觉的领导集团的系统的教育活动而产生

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1页。

②《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③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5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84页。

④Antonio Gramsci, "Some Aspects of the Southern Question (September–November 1926)," in *Pre-Prison Writing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16.

⑤[英]洛伦佐·福萨罗：《解析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李翼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页。

⑥[意]朱塞佩·费奥利：《葛兰西传》，吴高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2页。

⑦李安峰、牛海涛：《〈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唯物史观方法论及启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论丛》2025年第1期。

⑧《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页。

⑨孙来斌：《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的,而是通过‘常识’(即传统的流行的世界观)所阐明的日常经验而形成的。”^①葛兰西承认工人阶级基于生活经验积累的“常识”具有一定的真理成分,并非完全依赖外部灌输,但因为这些常识大多以未加批判的论据为基础,所以需要无产阶级政党与有机知识分子进行引导。因此,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便不再是简单地否定或灌输,而是“引导人民大众进行融贯的思维以及以同样融贯的方式去思考现实的当今世界”^②,从而形成自觉的、统一的“集体意志”。这就将阶级意识的形成视为一个教育性的、对话式的实践过程。

综上所述,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历史出场与在场,是在对多元思想基因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在对抗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其将文化建构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衔接起来。正如斯特里纳蒂所说:“葛兰西理论著作背后有两个相互联系的目标……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主义和决定论战斗,提出一种认识到了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自主性、独立性、重要性的上层建筑理论。”^③

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在张力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跳出了传统权力研究的线性认知框架,以辩证思维解构意识形态权力的复杂样态,并将其界定为充满动态博弈与矛盾统一张力的复合体。解码这一张力结构,意味着超越对意识形态内容的静态分析,深入其生成、维系与争夺的过程性与关系性逻辑,从而为透视一切旨在塑造共识的隐性权力形态提供批判性分析工具。

第一,政治与文化的交融构成了文化领导权的出场语境,其中内嵌着“强制与认同”“对抗与协商”“吸纳与支配”等多重权力形态的交互。在葛兰西之前,权力虽被置于“集体意志”与“国家精神”的范畴中讨论,但长期受限于规范性的政治话语,其内涵也被简化为统治阶级通过国家机器实施的单向政治支配。在这一视角下,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这一文化因素处于彼此分离的平行状态,导致传统权力理论始终停留在“压制-服从”的单向度认知层面,既无法揭示权力合法性持久维系的文化根基,也难以解释被统治阶级为什么会产生主动认同或隐性抵抗的文化心理,最终陷入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动态再生产逻辑的阐释困境。正是这一理论困境构成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出场的历史契机与逻辑前提。基于对这一理论困境的批判性超越,葛兰西通过区分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系统阐释了统治权(domination)与领导权(hegemony)的本质区别,进而揭示了文化领导权内含的三重张力:其一是暴力强制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张力。统治权依托资源垄断与暴力威胁等显性强制手段维持权力合法性,遵循“压制-服从”的单向逻辑;而领导权则通过支配精神生产与道德教化,实现“说服-同意”的双向互动。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权力既是精神教化的软性引导,又是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刚性基石,从而确立了文化领域作为权力博弈基础场域的核心地位。其二是文化的载体功能与抵抗潜能的张力。暴力强制与文化认同的辩证耦合并非抽象的权力建构,而是需要依托特定的文化载体得以落地。然而,文化载体在承载权力意图的同时,其意义的多重性与阐释的开放性又为自身抵抗预留了空间。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文化本身不反对权力,如果文化抵抗权力,它自己本身就是权力不可抗拒的形式。”^④这就意味着,任何挑战现存权力的文化形式,都可能被权力结构所吸纳并转化为巩固自身的资源。文化既是权力支配的载体,又蕴含着抵抗权力的潜在可能,这一矛盾构成了领导权持续博弈的内在动力。其三是文化吸纳与阶级支配之间的张力。文化载体中抵抗与吸纳的持续博弈,其本质是阶级关系的具象化呈现,最终必然指向阶级支配的核心目标。葛兰西指出,领导权并非静态压迫,

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9页。

②[意]安东尼奥·葛兰西:《实践哲学》,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6页。

③[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3页。

④[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97页。

而是持续谈判、妥协与重塑的动态过程。资产阶级霸权的巩固并非依靠消灭工人阶级文化,而是通过联系并重构其文化形式,将其“转译”并整合进自身的意识形态框架,从而在“吸纳”中实现“支配”,维系一种看似包容实则规训的霸权平衡。正如托尼·本尼特所指出的,“他(葛兰西——引者注)‘透析’出资产阶级霸权的巩固不能希冀于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重要的是联系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并且在此形式的表征中来组建资产阶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从而它的政治属性,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改变”^①。由此,在葛兰西的理论视域中,政治与文化已不可分离,“换言之,政治问题与文化问题混为一谈,因此变得非常棘手”^②。政治由此扩展为一种弥散性的文化政治,而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与实践,正是要把握在此场域中进行权力博弈的复杂逻辑与内在紧张。

第二,市民社会、有机知识分子与“阵地战”构成文化领导权实践的核心要素,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始终贯穿着场域的结构约束与行动者能动性之间的动态博弈。市民社会作为意识形态权力柔性运作的核心空间,其内在架构天然构成了行动者实践的结构边界,而这种结构性约束又恰恰为行动者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特定空间。市民社会并非抽象的空场,其内部天然存在“像教会、工会或学校这样的一些所谓私人组织而行使整个国家领导权”^③的隐性权力节点,这些节点交织形成了权力渗透的既定结构,构成了对行动者实践的基础性约束。正是基于这一结构特征,葛兰西将“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领导权’职能”的市民社会,连同“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④的政治社会,一并包括在现代国家这一“完整”的复合体范畴之中。政治社会承担的是凭借暴力进行“直接统治”的“守夜人”和“卡宾枪手”角色,而市民社会则承载着改造大众“常识”以达成“共识”的教化功能。统治阶级正是在市民社会“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义务’”^⑤的表象下,潜移默化地将其政治理念植入大众的行为方式和道德观念之中,从而以“自愿认同”的形式实现权力渗透。这种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方式、能动实践适配结构特征的辩证关系,正是市民社会场域中结构性约束与行动者能动性动态博弈的具象化表征。

作为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的核心行动者,有机知识分子的“阶级依附性与中介能动性”双重属性,本质上是场域结构性约束与行动者能动性动态博弈的集中体现,其存在与实践恰恰衔接了市民社会的结构特征与权力运作的能动需求。作为“直接将知识分子问题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来谈论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⑥,葛兰西打破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传统划分,将有机知识分子定位为“在各种程度上是全社会‘中介’的结构,是上层建筑的综合,也是上层建筑‘活动家’”^⑦。这一角色定位本身就蕴含着结构性约束与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其中,“阶级依附性”决定了有机知识分子必须依附特定阶级获取存在合法性。“作为统治集团的‘管家’”^⑧,通过“将社会领导和政治管理职能现实化”^⑨,传递特定集团的阶级意志并营造共识秩序,这是其无法脱离的结构边界,同时,“中介能动性”则是其突破结构性约束、适配场域需求的具象呈现。作为联结统治阶级与大众的纽带,有机知识分子借助各种文化和道德活动,将系统化与理论化的阶级意识“转译”为大众可以接受的日常生活常识,构建一种“自由的个人都能够进入一种共同意志,而不是作为纯粹私人性的个体进入相互冲突状态”^⑩的共识秩

①吴士余主编,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4页。

②[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③[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4页。

④[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旻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18页。

⑤[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92页。

⑥[美]卡尔·博格:《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蔡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页。

⑦[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⑧[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⑨[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7页。

⑩仰海峰:《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研究》,《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

序。有机知识分子的能动性发挥始终受制于阶级依附的结构性约束,而其能动性实践又反过来强化或重塑了阶级统治的结构形态,这一辩证关系促使其成为夺取文化领导权的主体力量。

“阵地战”作为葛兰西为有机知识分子量身定制的斗争策略,是场域结构性约束与行动者能动性动态博弈的实践方案,其本质是行动者在认清市民社会结构特征的基础上,主动突破结构性约束的战略选择。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使葛兰西深刻认识到,对于这种由“一切私人组织(有两种:自然、契约或自愿)”^①构成的“巨大文化-精神网络”^②的西方社会来说,东方国家所采取的正面而直接的“运动战”策略很难奏效,这是对场域结构性约束的清醒认知。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有机知识分子摒弃了通过一次正面突击(运动战)夺取国家政权的激进革命路径,而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进行一场持久且耐心的“分子式入侵”,逐个收复学校、媒体、工会等散乱的文化“阵地”,从而逐步改造大众观念,削弱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根基。因而,这种以能动策略突破结构边界的“阵地战”策略,本质上既是对现有结构性权力的战略承认,又是通过自觉的、有组织的能动性实践逐步改变这些结构的革命过程。

第三,意识形态具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葛兰西着眼于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转化为大众日常生活体验的具体过程,将文化领导权界定为资产阶级统治合法性的关键因素。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的本质规定为意识形态权力的合法性生成与维系,并将其最终目的锚定为将统治阶级的价值立场内化为社会大众的自觉认同,进而凝聚“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这一过程并非单向度且同质化的塑造,而是始终伴随着多重内在张力的动态博弈。这些张力共同作用,推动着体系化思想向生活化体验转化。其一是表现形式上的意识形态的自然化呈现与阶级性内核之间的内在张力。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之所以摒弃暴力强制与政治高压手段,本质上是为了更顺畅地实现体系化思想的生活化渗透。唯有借助家庭、学校、新闻媒体等日常文化场域,将特定阶级的意识形态隐性植入大众观念,并进而转化为其生活习惯和行为准则,才能以“天然合理”的表象完成思想规训。这种“去阶级化外衣”的外在表征,并未消解阶级支配的本性,而是通过弱化外在强制性并强化内在体验感,使阶级性内核深度融入大众日常实践,形成“表象自然化”与“内核阶级性”相互支撑的权力形态,为思想转化提供了隐性载体。其二是作用机制上的自上而下的理性设计与自下而上的情感认同的内在张力。葛兰西深刻认识到,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高明之处在于跳出“理论”与“常识”的二元分立:若将抽象阶级理论强加于大众,便会割裂思想与生活的关联;若完全依附大众零散的感性常识,又会丧失意识形态的引领性。这种“不强制”与“不否定”的辩证平衡,使其能够重新阐释庞杂甚至矛盾的大众日常经验并赋予其统一意义,最终将符合统治逻辑的话语叙事固化为看似不言自明的“普世真理”。其三是实践策略上的无意识渗透与有意识反抗之间的内在张力。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以“常识”为具象载体与伪饰,致使大众在日常实践中不自觉地沦为权力支配的对象,而无产阶级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过程是对上述过程的反向消解。无产阶级放弃对上层建筑的直接冲击,转而将微观认知领域作为突破口,通过“分子式”的批判性解构与意义再造,潜入日常生活的“感觉经验”中,在瓦解旧有权力的情感根基的同时,构建起新的意识形态认同,最终促使新的集体意志在生活化体验中“有机生长”,实现思想向体验的正向转化。正是在上述多重张力的共同驱动下,意识形态权力实现了从抽象“思想体系”向具体“社会实践”的关键转变。诚如伊格尔顿所称赞的,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实现了从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到作为被体验、惯常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的关键性转变,这种实践因而也许既包括社会经验无意识的、不能言说的向度,又包括形式上的机构的运作”^③。这一微观转化机制,正是文化领导权得以长久维系其合法性的深层奥秘。

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②任洁:《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

③[英]特里·伊格尔顿:《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及其兴衰》,载[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德]泰奥德·阿多尔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58页。

总之,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持久生命力在于其提供了一套解码意识形态权力复杂性的辩证方法。正如威廉斯所说:“按照葛兰西的说法,‘文化领导权’构成了在其控制之下的多数人的常识的内容及局限,所以它把任何源于基础和上层建筑公式的观念清晰得多地对应于社会经验的现实。”^①也就是说,葛兰西并未提供关于权力认知的标准答案,而是构建了一个充满内在张力的分析框架:权力既是强制也是同意,既在宏观结构中也在微观实践中,既由理性设计也靠情感维系。正是这种对权力动态性、关系性与矛盾性的深刻把握,使其文化领导权理论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观点,成为持续激发后世批判性地考察“文化权力”与“意识形态话语”的源动力。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对资本主义统治机制的剖析,更在于为理解一切试图通过塑造共识而行使的权力的机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分析范式。

三、对文化领导权解读范式的反思与超越

当代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研究与社会批判的文化转向,其深层理论渊源与逻辑起点直指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葛兰西的理论创新不仅突破了传统意识形态研究的认知局限,而且直接推动了后来学界对文化领导权解读范式的深度反思与创造性超越。这种范式革新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维度:一是在理论根基的重构上,葛兰西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语境中将意识形态简单等同于“虚假意识”的认知偏见,将其重新界定为政治权力运作的积极构成要素,形成了意识形态与领导权“一体两面”的致思理路。这一理论突破启发后来的学者超越传统“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机械决定论,转而聚焦资本主义权力运作通过文化、教育、媒介等非强制方式实施其“治理术”的隐性机制,并在此分析框架下探索打破权力桎梏的可能性路径。二是在斗争场域的拓展上,传统解读范式往往将意识形态斗争局限于上层建筑的宏观政治领域,忽视了大众日常经验与“常识”体系中潜藏的权力博弈。葛兰西将“常识”确立为意识形态争夺的核心腹地的理论创新,触发了后来的文化研究与社会运动理论对传统斗争场域认知的反思与重构。在身份政治兴起的多元化价值语境中,着力批判主流意识形态如何将边缘群体构建为低等的“他者”,为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社会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三是在实践指向的深化上,葛兰西通过强调意识形态建构与政治合法性维系之间的内在辩证张力,为后来的政治实践范式的反思与优化提供了核心理论参照,启示后来的研究者与实践者反思传统实践范式割裂政治统治、社会变革与文化共识之间内在关联的局限性,从而超越单纯依赖制度设计或暴力革命的传统思路,高度重视文化领域领导权构建的战略价值。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理论家更大地拓宽了政治重组和领导权领域”^②,其核心突破在于将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结构界定为构成社会有机体的客观物质性要素,而非统治阶级刻意编造的语言假说和道德说教,进而从积极意义上明确了夺取文化领导权对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的关键性作用。^③这一独到见解,既为阿尔都塞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打破传统社会主义实践策略的“失语”困境奠定了思想基础。与葛兰西的积极阐释路径不同,阿尔都塞侧重于从否定性维度解读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导权的内在关联,认为“文化不是真正的群众的意识形态,而是统治阶级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教育或其他手段试图向其所统治的群众反复灌输的意识形态”^④。在阿尔都塞看来,“作为社会矛盾潜移默化的掩盖工具”^⑤,意识形态隐

①[英]雷蒙德·威廉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的基础和上层建筑》,胡谱忠译,《外国文学》1999年第5期。

②[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③参见万玉琛:《葛兰西意识形态思想的政权意蕴及当代启示》,《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

④[法]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陈越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⑤孟登迎:《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8页。

藏着统治阶级政治意志的虚假性特质,并进一步将资本主义剥削的真实经济关系包裹在“自由权利”的政治表象之下,从而以一种“把具体的个人唤问为具体的主体”^①的隐蔽方式,促成个体在学校、家庭、宗教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导的社会场域中,自觉认同并践行这种意识形态。

拉克劳与墨菲则在葛兰西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领导权理论的“话语转向”。拉克劳和墨菲扬弃了将意识形态简单看作阶级利益的观念反映的传统观点,转而将其界定为一种能够“围绕着许多基本的链接原则把‘历史集团’焊接在一起的”^②的话语“接合”实践。即通过话语策略,将异质性的社会诉求(如性别、种族等)临时性地链接起来,构建一个具有政治行动力的“集体意志”。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认同日趋碎片化,政治斗争的关键不再依赖于某个先定的阶级主体(如无产阶级),而是在于在多元身份与诉求之间成功建立一种动态的、话语性的领导权链接。如此一来,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中被寄予厚望的无产阶级,便逐渐丧失其作为社会革命领导力量的主体优势。这一转向同时也意味着,若要促使社会主义理念重新焕发生机,就必须超越对政治主体阶级属性的本质主义理解,通过“知识分子和道德领导权的较高综合”^③,构建一种能凝聚多种立场的“人民”意志,最终实现“不同目标的多样分散意志以一个目标被焊接在一起,在同等的和共同的世界观基础上达到文化-社会的统一”^④。从建设性的角度来看,拉克劳和墨菲所推动的“文化领导权”的“后现代转向”,进一步揭示了在政治主体碎片化和价值认同异质化的开放性社会场域中,文化与意识形态博弈对于“构建服务于不同政治目的的行为主体”^⑤具有重要意义,其通过打通意识形态与权力话语的深层勾连,为在政治领域搭建起多样性的主观载体与“认同之链”,从而为理解女性主义、生态运动、反种族主义等非阶级形式的当代社会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分析框架,凸显了在价值分化的社会中进行意识形态链接与政治主体构建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虽然阿尔都塞与拉克劳、墨菲的理论拓展了意识形态分析的维度,但在不同程度上悬置了意识形态生成与变革的社会历史根基。阿尔都塞的结构分析虽然深刻揭示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物质性与主体建构功能,但是相对淡化了其内含的批判与变革潜能;拉克劳与墨菲的话语转向虽然敏锐把握了身份政治的流动性与偶然性,但是将领导权斗争收缩为话语层面的策略性接合,弱化了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制约。因而,这两条路径均未彻底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性历史批判,也未完全摆脱其自身所描述的意识形态运作逻辑。正是在此理论背景下,葛兰西方案的独特意义得以凸显:葛兰西始终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锚定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与阶级实践,坚持通过改造意识形态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物质社会关系,以探求真正的社会解放。这种将宏观权力分析与微观主体塑造相结合的总体性视野,不仅超越了单纯的否定性批判或话语建构,而且构成了后续文化批判理论——如法兰克福学派工具理性的揭露与伯明翰学派对日常生活文化政治的考察——将意识形态分析深入微观实践与主体意识领域的重要起点。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将意识形态的关注视角从宏观阶级博弈,扩展到个体生存状况的微观境遇,为法兰克福学派继承葛兰西关于意识形态渗透日常生活、宰制主体意识的核心判断,聚焦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异化的具体形态,从而深化对文化领导权运作机制的批判性阐释提供了思想资源与理论引导。葛兰西认为,文化是人类超越自然本性、彰显主体性的能动性载体,但在资本社会化和劳动力商品化的历史语境中,这一能动性的发挥日益为“物化的知识力量”——技术理性——所束

①[法]路易·阿尔都塞:《论再生产》,吴子枫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68页。

②孙民:《政治哲学视阈中的‘意识形态领导权’——从葛兰西到拉克劳、墨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1页。

③[英]恩斯特·拉克劳、[英]查特林·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尹树广、鉴传今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页。

④孙民:《何谓“新葛兰西主义”——拉克劳、墨菲对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超越》,《兰州学刊》2009年第12期。

⑤[英]乔治·拉雷恩:《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戴从容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03页。

缚。统治阶级通过垄断并操纵文化传播媒介,将娱乐化、舒适化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包装为“理想生活范式”,以此禁锢社会主体的精神想象与批判意识,实现意识形态的隐性再生产。面对总体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兰克福学派在葛兰西的基础上,将对文化领导权的分析进一步推向对“文化工业”与工具理性的系统性批判。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等人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生产已高度标准化与商品化,其提供的“满足”本质上是预先设计好的、大众只能被动接受的虚假需求。这种文化工业不仅像葛兰西所说的那样传播特定意识形态,而且从根本上塑造了人们的感知结构与思维习惯,使大众在不间断的消费与娱乐中,丧失了对现状进行否定性反思的能力。工人阶级沉溺于“被资本所营造的永恒的‘匮乏感’不断推向‘剁手’和猎奇的消费狂欢”^①,个体的批判性思维也在同质化的精神生产中逐渐消解。基于此,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不同于葛兰西“阵地战”的解放路径。他们认为,在文化工业的全面掌控下,单纯争夺文化领导权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寻求一种能够超越工具理性的否定性力量。因此,马尔库塞等人倡导“文化大拒绝”的激进姿态,并赋予“艺术审美救赎”革命性内涵,试图通过捍卫艺术的自主性与超越性,恢复主体被压抑的否定性维度,从而唤醒一种能够挑战现有权力逻辑的反抗意识与斗争精神。这既是对葛兰西微观文化斗争思想的深化,也是在文化工业时代对其乐观策略的一种批判性反思与超越。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将文化视为动态的权力场域,为伯明翰学派跳出单纯的经济决定论,深入分析大众文化实践中的支配与抵抗,提供了发挥关键作用的理论框架。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逻辑向文化领域的深度渗透,消费主义盛行与身份政治兴起等一系列社会变迁,推动了权力运作方式向更隐蔽、更弥散的形态转变。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敏锐地把握了这一变化,其研究视域从传统的阶级分析扩展至性别、种族、亚文化以及身份认同等多元维度,试图通过“解码意识形态暗含在‘个体’与‘社会’动态关系之中的输出过程”^②,揭示大众如何在消费、阅读与日常生活中,既接受又抵抗主导意识形态的召唤。在此理论视野下,伯明翰学派进一步发展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不再将大众视为完全被动的文化接受者,而是强调其在意义解读与实践中的能动性。威廉斯通过对“情感结构”“残余文化”与“新兴文化”的深入阐释,分析了文化实践中蕴含的、可能颠覆主导秩序的变革潜力,以此激活被压抑的主体意识。斯图亚特·霍尔则通过对媒体编码与解码机制以及身份政治的研究,揭示了权力如何通过表征系统(如种族、性别的刻板印象)建立文化霸权,同时论证了从属群体通过差异政治进行反霸权实践的可能性。可以说,伯明翰学派实质上是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落实到具体而微的社会经验与文本分析之中。其既继承了葛兰西对文化与权力关系的基本判断,又通过聚焦接受主体的复杂性和文化意义的多元性,超越了将领导权斗争简化为单向灌输或纯粹阶级对抗的解读范式,从而在更精细的层面上,描绘了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中既构建主体又遭遇反抗的复杂图景。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与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延续了葛兰西将意识形态锚定于现实生存实践的基本立场,并且通过批判性超越拓展了文化领导权的解读维度。然而,其在拓展文化分析维度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争夺锚定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这一核心坐标,从而弱化了领导权理论本应具备的、改造社会权力结构的总体性革命意涵。具体说来,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审美救赎”与“大拒绝”策略,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往往陷入乌托邦色彩浓厚而革命主体缺位的困境;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及其对多元身份与微观政治的重视,也可能稀释乃至淡化阶级矛盾作为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从这一角度来说,回归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本真要义具有历史必然性,意味着重新强调文化领导权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性统一。葛兰西虽然重视市民

①包大为:《猎奇与浪费:消费主义的博物学样态及其批判路径》,《学术交流》2021年第2期。

②David Morley, *Television, Audiences and Cultural Studies*,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p. 90.

社会的文化斗争,但其根本旨归始终是通过有机知识分子的“阵地战”,在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同时,锻造出能够承担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集体意志。这一理论内核,对于当今全球南方国家在文化渗透与数字殖民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不局限于单纯的捍卫文化身份和调整话语策略,而是将文化自主性的构建内嵌于寻求政治经济独立、探索替代性发展道路的整体性革命实践之中,具有重大启示意义。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实践不仅是对葛兰西文化遗产的批判性继承,更是对其革命性内核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激活与践行。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时代,文化领导权正经历着从传统阵地向网络空间拓展、从西方中心向多元主体对话的深刻转型。作为“人民群众历史意识的体现”,葛兰西将文化领导权的本质界定为“建立在自觉自愿承认的威信之上”^①的合法性建构。换言之,意识形态的核心政治功能是为现存权力秩序提供合法性辩护,从而唤起民众对国家共同体话语体系的信仰与认同。对于亟需构建体现本民族和本国特色的意识形态,以实现自主发展的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既面临着西方通过文化霸权实施新殖民控制的压力,又存在着本土文化认同碎片化且现代性因素发育不足的问题。这一文化领导权建构所面临的挑战,在以算法垄断与数字殖民为特征的数字化时代进一步加剧。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力量,需要自觉借鉴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巩固国家和民族文化主权,巩固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为打破西方话语垄断、探索后发国家的文化自主权与话语权提供实践范本。一是巩固并拓展意识形态的“数字阵地”。葛兰西将坚守市民社会及其意识形态阵地视为政治权力永葆生机的前提条件,这一理念在数字时代仍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对于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来说,既要巩固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思想舆论阵地的引导力,又要不断扩展社交平台、算法推荐、数据中心等数字核心阵地,通过搭建适配本土语境的数字传播平台并优化多语种算法模型,打破西方算力与算法垄断。同时,以规范化治理净化数字舆论生态,建立跨境数字内容审核机制,严防西方错误思潮通过数据流动侵蚀本国主流价值观。二是培育一支强大的意识形态工作者队伍。葛兰西认为,有机知识分子是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是捍卫文化领导权的“关键少数”。在数字化时代,“先进生产力的引领者、先进科学技术的主导者,始终是意识形态变革主动权的掌握者”^②。为此,一方面,要强化对知识分子的理论武装与思想引领,“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进而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③;另一方面,要激励广大知识分子深入数字社群与大众文化实践,成为连接党和政府与多元社会群体的“数字意见领袖”,在有机互动中整合差异化文化需求,使我国的意识形态工作更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三是构建兼具民族特质与全球共识的数字文化话语体系,化解文化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资本的跨国流动与数智技术的突破模糊了文化传播的边界,因此,要立足本国国情,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解读数字时代的政治实践,将本土文化符号与现代数字传播技术相结合,打造群众易于接受的文化话语。同时,借助开源技术协作、多语种内容共创等交互模式,联动全球南方国家构建多元共生的话语联盟,打破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话语垄断与文化霸权。“全球南方不应是全球化理论中的‘他者’或注脚,而应是其不可或缺的共同书写者。”^④

以往西方学界对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解读,或陷入结构主义的否定性批判,或止步于后现代话语的碎片化整合,未能充分释放其与具体社会现实及民族发展诉求相结合的构建潜能,更忽视了其对边缘国家实现文化自主的启示意义。有鉴于此,为激活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实生命力,亟需将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整体性分析范式和深刻的辩证智慧与全球格局变化及数字技术发展深度融合,为实现一种更具实质民主与文化解放色彩的社会秩序提供思想坐标与实践灵感。

①[意]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李鹏程编:《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45页。

②王璉:《新技术变革下意识形态治理研究——理论检审、现实叩问与治理出路》,《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④王先鹏:《“知识殖民”祛魅与文化主体性重建——全球南方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智慧》,《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5年第9期。

四、结语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内在张力集中表现为批判经济决定论、强调文化意识形态的自主性与构建力量,是否必然会滑向对物质基础决定作用的“唯心主义”偏离。对此,有学者指出,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因“片面夸大了意识形态的革命性,没有将无产阶级在政治社会开展的政治斗争与市民社会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有机结合,低估了资产阶级国家对意识形态强权控制的政治威力”^①,从而存在过于理想化的倾向。然而,这种所谓“偏移”恰恰是葛兰西针对二十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困境所进行的战略修正与焦点转移。葛兰西并非否定政治经济斗争的根本性,而是旨在强调和突出经典理论中被忽视的维度——统治得以维持的文化认同基础与革命所必需的集体意志塑造。因此,戴维·麦克莱伦指出,葛兰西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倾向于通过上层建筑来分析基础,并在间接的意义上解释历史唯物主义”^②的辩证方法,这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垄断资本主义新情境下的具体化与深化。由此可见,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揭示了一个根本性的政治真理:任何稳定的权力秩序,都必然嵌套于某种获得积极认同的文化叙事之中;而任何深刻的社会变革,也都无法绕开对日常观念与“常识”领域的漫长争夺。这一洞见超越了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孰轻孰重的抽象争论,而是聚焦政治权力运作的结合点——意识形态将物质力量转化为权威以及使文化实践具备政治效能。基于此,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遗产对于当代的借鉴意义是:为在数字化与全球化交织的时代语境中,分析意识形态权力以弥散且沉浸的方式实现布展与再生产提供分析框架;同时为所有寻求文化自主与社会变革的力量指明在思想与话语战场上构建替代性领导权的实践方向。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给予我们最根本的启示是:真正的解放不仅需要改造经济社会结构,而且需要获得人们头脑与心灵的认同。

The Power Connotations of Ideology: The Internal Tensions of Gramsci's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and Its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Yang Xiaotong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emergence of Gramsci's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is deeply rooted in Italy's indigenou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while also inheriting the lineage of Marxist class 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Lenin's thought of leadership. To unravel the hegemonic logic of invisible power in capitalist political society, Gramsci regarded civil society, organic intellectuals, and "position warfare" as the basic elements for the proletariat to seize cultural hegemony. This dialectical thinking that emphasizes both the "conceptual agency" of cultural ideology relative to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material constraints" that cannot be divorced from concrete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balance of class forces, constitute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Not only does Gramsci's cultural hegemony theory provide new analytical tools for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ideology and the cultural critique of capitalist society, it also offers important intellectual insights to countries in the Global South as they seek to explore an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path that actively constructs their own cultural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while deeply aligning with their local socio-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Key words: Gramsci; cultural hegemony; ideology; power; legitimacy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潘西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39页。

^②[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李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4页。